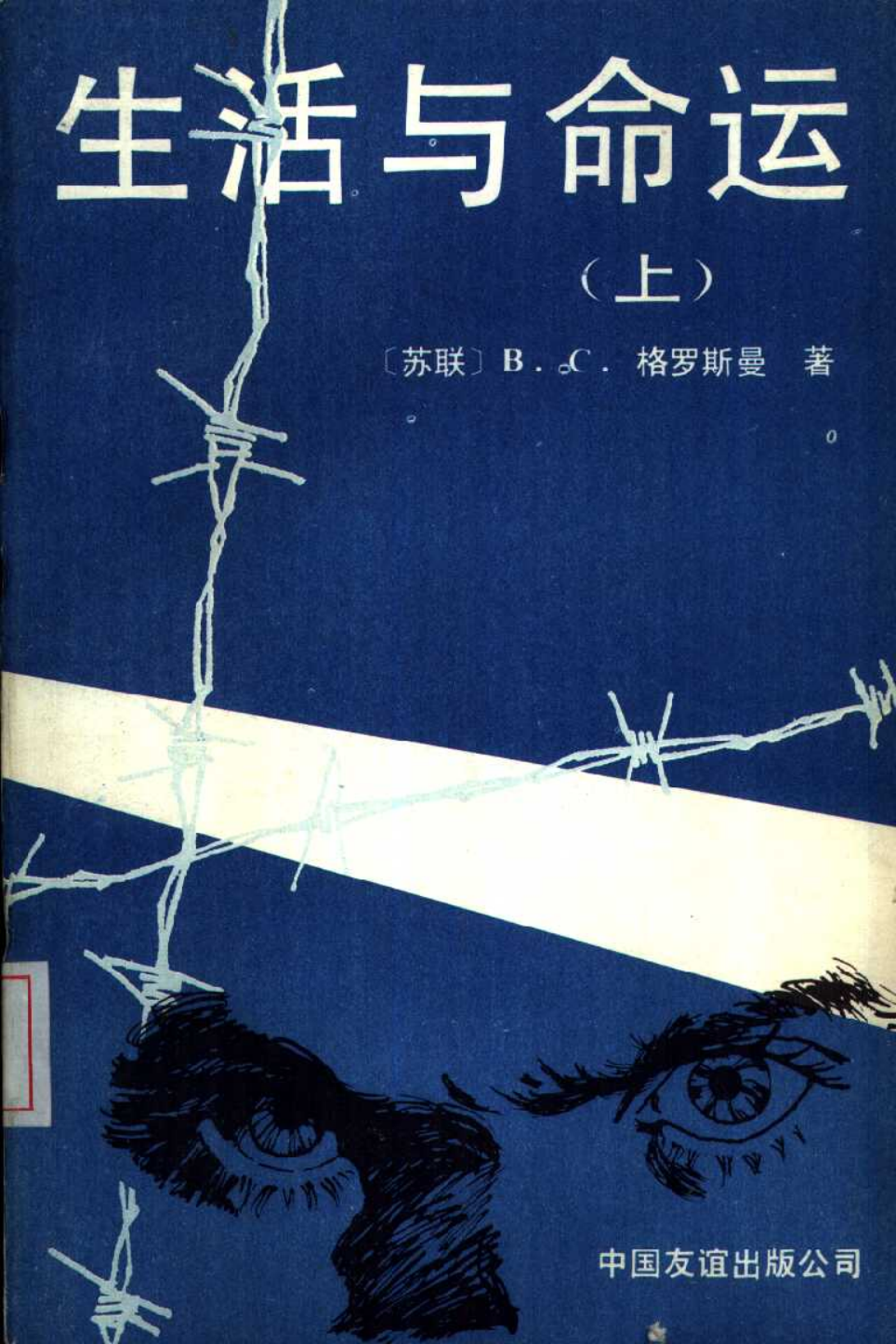


# 生活与命运

(上)

〔苏联〕B. C. 格罗斯曼 著

0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 生活与命运

(上)

〔苏联〕B. C. 格罗斯曼 著

王福曾 李玉贞 译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89年 北京

Жизнь и Судьба  
В · С · Гроссман

译自苏联《十月》杂志 1988 年 1—4 期

### 生活与命运

〔苏联〕В·С·格罗斯曼 著  
王福曾 李玉贞 孙维韬译

\*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中央党校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1/32 31·75 715000 字  
1989 年 5 月第一版 1989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ISBN7-5057-0177-0 / I · 103 定价：10·60 元  
(内部发行)

## 译者序

格罗斯曼的长篇小说《生活与命运》，这部被苏联国内和西方誉为当代《战争与和平》的恢宏巨著，经过译者一年的努力，现在终于和中国读者见面了。

每当伏案工作之余，闭目遐想的时候，不知怎么，我的脑海里总浮现出这位可敬的作家腋下夹着手稿，在寒风凛冽中，为这部书的出版四出奔波，行色匆匆的身影……我深深地为他坎坷的一生，为他这部奇书的坎坷遭遇嗟叹，惋惜。

瓦西里·谢苗诺维奇·格罗斯曼（1905—1964）早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数学物理系，当过化学工程师。苏联卫国战争期间，他在战火最炽、环境最为险恶的斯大林格勒前线任战地记者。战后，他的中篇小说《人民是不朽的》成为苏联很有影响的、描写卫国战争的作品，赢得了广泛的声誉。这部书于1949年由著名作家茅盾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此后，格罗斯曼又写了长篇小说《为了正义的事业》，书中有的内容触犯时忌，1953年遭到围攻批判，但格罗斯曼并未因此消沉。

1960年，格罗斯曼苦心孤诣，呕心沥血写成《生活与命运》这部长篇小说。书稿送到《旗》杂志编辑部后，立刻被视为洪水猛兽。据说，他的书稿曾被送到内务部审查，很快，祸从天降，他的家遭到查抄，手迹，信件，打印稿，乃至打字机的色带，也被席卷而去。作者为了此书的出版，还曾上书当时

的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情词恳切，要求还他这本书以“自由”。后来，主管意识形态的苏斯洛夫又召见他，明确指出，这部作品也许二百年后才能出版。作家受此精神打击，4年后，郁郁而终。至80年代初，有人将书稿拍成缩微胶片，辗转带到国外，先后在瑞士、美国出版，从此在西方声名大噪。1988年，随着苏联国内改革大潮的汹涌澎湃，格罗斯曼这部小说才得以重见天日，正式在自己的祖国苏联出版。此书目前在苏联国内的开禁作品和反思文学中，是最有影响的畅销书之一。

格罗斯曼是一位使命感和忧患意识十分强烈的作家，他热爱人民，关心国家命运，他在这部小说中，回顾历史上的悲剧，思索现实中的积弊，写战争的残酷，写德国集中营的屠戮，写苏联劳改营的血泪，写政治迫害的暴戾，写苏联社会中的个人迷信，思想禁锢和践踏民主与法制。他百感交集，痛定思痛，上下求索，抒尽了他胸中的块垒和积郁，完成了这部思索型的小说。苏联一位著名的批评家曾说：“格罗斯曼在1960年就懂得了今天我们才懂的东西。”1959年，格罗斯曼在结束这本书的写作时，写道：“书的命运最近就要和我分离了。它将独自实现自我。”不错，作家虽然早已不在人世了，然而，他的这部遗著是永存的，《生活与命运》必将历久弥新，成为苏联文学中的传世之作。

是为序。

王福曾

1989年4月25日

施特鲁姆携妻子女儿在飞雪飘舞的冬日到了莫斯科。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芙娜不想丢弃工厂工作，就留在喀山，尽管施特鲁姆已开始奔走，想把她安排在卡尔波夫研究所。

这些日子里人们有一种特别的感觉——喜忧参半。德国人似乎依旧威风凛凛，势力强大，在为一次又一次激战进行准备。

战争似乎尚未见转机。但是人心自然而然合乎情理地渴望回莫斯科去，政府开始安排某些机关撤回莫斯科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人们已经隐约感到战争转机的先兆了。不过在战争的第二个春天，首都依旧是一片郁郁不乐愁绪难耐的气氛。

厚厚的积雪堆满了人行道。城郊的街巷间的小路，象是农村的小径，连结着从住户家门到电车站和食品店之间的通路。许多住家的窗户里伸出罗马尼亚式火炉的铁烟囱，墙上挂满了浓烟薰黄的冰锥。

莫斯科人身着短皮袄，裹着头巾，象是乡下人打扮。

维克多·帕甫洛维奇坐卡车离开火车站。他坐在车内的行李上，打量着身旁的娜佳愁眉不展的面容。

“小姐，怎么了，”施特鲁姆问，“莫斯科是你在喀山时幻想的那个样子吗？”

娜佳为父亲猜透了她的心思有点恼火，什么也没有回答。

维克多·帕甫洛维奇开始向她解释：

“人往往不明白，他建造的城市并不是自然界本来就有的一个部分。为了捍卫人类文化免遭毁坏，人必须时刻握枪防豺

狼，持铣锄莠草，拿扫帚除积雪。稍一疏忽，停上一两年，就会前功尽弃，森林里豺狼出没，杂草丛生，城市被雪掩埋，尘封三尺。多少古城已经淹没在尘沙之下，积雪覆盖，长满荒草。”

施特鲁姆想让坐在驾驶室里司机旁边的柳德米拉也听到他那番议论，便从车旁探过身去，通过半开的车窗问道：

“你坐得舒服吗，柳芭？”

娜佳回答说：

“根本就是勤杂工没有扫雪，哪里说得上什么毁灭文化？”

“你可不对了，”施特鲁姆说，“你看看这些大冰块。”

卡车猛烈地颠了一下，车上所有的包裹箱子都被颠起来，施特鲁姆和娜佳也摇得东倒西歪。两人相视大笑。

奇怪，真是奇怪。他哪能想到，在这一年的战火纷飞中，来到喀山，虽然抛离故土家园，心情烦闷，可是他竟完成了一件最重大工作？

莫斯科一步近似一步，他们好像只会产生一种深深的激情，对安娜·谢苗诺芙娜、托利亚、玛鲁霞的思念和对几乎每个家庭都遭到牺牲的思索，好象与回归家乡的喜悦汇合起来，使人有充实感。

然而并非一切尽如人愿。在火车上，施特鲁姆常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动肝火。见柳德米拉·尼古拉耶芙娜只顾睡觉，而不看窗外她儿子保卫过的那片国土，也让他生气。她熟睡中鼾声大作，乃致一个穿过车厢的伤兵听到鼾声后说：

“嗨，大兵派头。”

娜佳也让他生气。她吃完饭后，母亲端走了剩饭，可娜佳非常自私地从提包里挑了几个烤得最好的饼。她在火车上操着一种让人啼笑皆非含有讥笑的腔调对待父亲。施特鲁姆听见她

在隔壁车厢里说：“我爸爸是个大音乐迷，他自己还能嘭咚两下钢琴呢。”

车厢里邻座的人在谈莫斯科运河的修建工程和集中供暖系统，谈那些无忧无虑的人，谈论往莫斯科带什么食物上算。这些柴米油盐的琐事，施特鲁姆听了很心烦，可是他也插话，说说房屋管理员，自来水管一类的事。夜不成寐时，他想的是加固莫斯科的配电盘；想的是电话线掐断了没有。

一个恶狠狠的婆娘打扫车厢时，从坐椅底下扫出施特鲁姆丢的鸡骨头，便说：

“哼，整个一群猪，这也算什么文明人。”

施特鲁姆和娜佳在穆罗车站月台上散步，打几位穿羊皮领大衣的年青人身边走过，听其中一位说：“阿勃拉姆也撤回来了。”

第二个人说：

“阿勃拉沙急于得到保卫莫斯科勋章。”

到卡纳什车站了，火车停在一列运犯人的专列对面。犯人们把脸贴近钉了木条的窗口向外看，高声喊着：“抽烟，”“给点烟叶。”哨兵们连喊加骂，赶犯人离开窗口。

晚上他到隔壁索科洛夫一家坐的车厢去。玛丽娅·伊万诺芙娜头上裹着一条花围巾正在铺卧具，让彼得·拉夫连季耶维奇睡下铺，她自己睡上铺。她只管操心，怕彼得·拉夫连季耶维奇睡不舒服，所以对施特鲁姆的问话所答非所问，甚至没顾上问问柳德米拉·尼古拉耶芙娜可安好。

索科洛夫打着哈欠，抱怨车厢里太闷，感到疲倦。索科洛夫漫不经心，并不为施特鲁姆的到来而高兴，结果又引起对他的不快。

“我可是平生第一次看见丈夫让妻子往上铺爬，而自己睡



下铺，”他怒气冲冲地说，但自己又感到惊奇，为什么这点事令他如此生气。

“我们一向都是这样的，”玛丽娅·伊万诺芙娜说，“彼得·拉夫连季耶维奇觉得在上铺太闷，可我无所谓。”

她吻了吻索科洛夫的鬓角。

“那我走了，”施特鲁姆说。索科洛夫夫妇未加挽留，这又让他怏怏不乐。

入夜，车厢里十分气闷。喀山，卡里莫夫，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芙娜，同马季亚罗夫的交谈，大学里狭小的办公室，一起浮现于眼前……施特鲁姆晚上常去索科洛夫家小坐，谈论国是。当时玛丽娅·伊万诺芙娜的眼神是多么亲切和蔼而又不安呀。可不象今天晚上这样漫不经心，冷漠无情。

“鬼知道怎么回事，”他想，“他自己倒睡下铺，又方便又凉快，这是什么家法。”

他一直认为玛丽娅·伊万诺芙娜是他认识的妇女中最贤慧的，又温顺，又善良。可此刻他迁怒于她，心想：“这个红鼻头的母家兔。彼得·拉夫连季这个人很难处，他温柔、矜持，但狂傲，自命不凡，心胸狭窄，爱记仇。是呀，她这个可怜虫少吃不了苦头。”

他无论如何不能入睡。于是在设想未来与朋友们的会见，见到切佩任的情景，许多人都已经知道了他的工作成果。等待他的是什么？他可是凯旋者啊。古列维奇·切佩任会对他谈些什么话？

他想到，制定新试验方针各个细节的马尔科夫过一个星期才能到莫斯科来，可他不来就无法开始工作。不论索科洛夫还是我，全都是丑角，是没有头脑、笨手笨脚的理论家……

是的，凯旋者，凯旋者。

不过这些思绪是慢慢悠悠涌现出来的。

眼前站的是吵着要“烟叶，”要“香烟”的人，是管他叫阿勃拉姆的那群小伙子。波斯托耶夫当着他的面向索科洛夫说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索科洛夫介绍了青年物理学家兰德斯曼的工作情况，波斯托耶夫说：“得了吧，兰德斯曼算什么，维克多·帕甫洛维奇有一个极重要的发明，一举扬名天下了，”他拥抱了索科洛夫，又说：“不过最主要的是咱们是俄国人。”

电话接上了吗？煤气能用吗？难道100多年前打败拿破仑后，人们回莫斯科的时候也想着这些鸡毛蒜皮的事吗？……

卡车在房门前停下。施特鲁姆又见到他私宅的千扇窗户，那玻璃上还贴着去年夏天糊上的十字交叉的纸条，又见到宅院的大门，路边的椴树；见到房管员门上写有“牛奶”字样的小木牌。

“电梯当然还不会开的，”柳德米拉·尼古拉耶芙娜说，然后转身问司机：“同志，您能帮我们吧箱子搬到三层楼上吗？”

司机回答说：

“哪怎么不能，可以。不过你们得用面包付给我劳务费。”

车上的东西都卸下来了。留下娜佳看着，施特鲁姆夫妇上楼。他们走得很慢，见到二层楼包着黑漆布的的门，熟悉的信箱，见到一切与旧日毫无两样而感到非常惊诧。真是奇怪，街道、房屋、忘却的一切东西都没有消失，又出现在眼前，人又置身于其间。

过去，托利亚经常不等着乘电梯，总是跑着上三层楼，从楼上向楼下的施特鲁姆喊：“嘿，我已经到了家了！”

“咱们先在楼梯口休息一会吧，你都气喘了，”维克多·帕甫洛维奇说。

“我的天哪，”柳德米拉·尼古拉耶芙娜说，“这楼梯成什么

样了。明天我就到房管所让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安排人清扫。”

就这样，他们两人，丈夫和妻子又站到了自家门前。

“也许你愿意亲手打开房门吧？”

“不，不，干嘛我开，你开吧，你是主人。”

他们进了屋，往各房间去走了一遍，没脱大衣。她用手摸了摸暖气片，拿起电话筒对着吹了吹，说：

“电话原来已通了！”

然后，她进了厨房说：

“水也有了，就是说可以用洗漱间了。”

她走到炉子跟前，试了试炉子的开关，煤气不通。

上帝啊，上帝，一切如初。敌人被阻住了。他们回到自己的家园。1941年6月21日那个星期六好象就在昨天。一切是多么与旧时无异，一切又发生了多少变化！别人也回到了自己的家，别人有别样的心绪，别样的命运和境遇。为什么这样心绪不宁，这样平平常常？为什么已经流逝的战前生活让人觉得这样美满，幸福？为什么想到明天就让人心烦，配给局，户口登记，限制用电，一会儿开电梯，一会儿又停开，订报？……夜里又卧在自己的床上静听熟悉的滴滴嗒嗒的钟声。

他走在妻子身后，忽然想起了夏日的莫斯科之行，容貌秀美的尼娜单和他一起饮酒，那空酒瓶至今还放在厨房的水池子旁边。

他回想起读了诺维科夫上校带来的母亲的信那一夜，他突然去切里亚宾斯克的情景。他就是在这里吻过尼娜，当时她掉了一个发卡，他们两人都没找到。他忽然感到不安，怕地上有个发卡，也许尼娜会把唇膏，粉盒忘在这里。

就在这时，司机气喘吁吁地把箱子提了上来，看了看屋子问：

“这都是你们的房子吗？”

“是，”施特鲁姆有些歉疚地回答。

“我家6口人住一间8米的房子，”司机说，“老奶奶白天趁别人上班的时候睡觉，夜里在椅子上坐着。”

施特鲁姆到窗前，见娜佳站在卡车旁边放行李处，蹦蹦跳跳地跺脚，吹手指。

亲爱的娜佳，施特鲁姆孤弱的女儿，这是她的家。

司机拿来了装食品的大口袋和装得满满的卧具袋，坐到椅子上卷烟。

显然，他当真关心住房问题，而且他总向施特鲁姆把话题引到保健标准，区房管所的贪官等事情上。

厨房里的锅咯唧唧地响。

“是女主人，”司机说，并向施特鲁姆示意。

施特鲁姆又朝窗外看了看。

“按部就班，按部就班，”司机说。“看着吧，等把斯大林格勒的德国人打败，我们的人撤回来，住房就更紧了。我们那里有一个工人负了两次伤，不久前回到工厂，当然，他家的房子全被炸平了，他和家里人就搬到不能住人的地窖里，他妻子怀了孕，两个孩子有肺病。地窖里进了水，齐膝深。他们就用条凳搭上板子，踩着板子从床上走到桌子，从桌子到炉灶。他申请要房子，给党委、给区委，甚至给斯大林写了信。老是答应给他房，许愿。一天夜里他带上老婆孩子和全部家当硬是占了区苏维埃5层楼上的一个空房间，那房子8.43平方米。这一下可翻天了！监察官传他去，立限他24小时内把房子腾出来，否则就发配他去劳改营5年，把孩子们弄到幼儿保育院去。他可真绝门儿了，把战功勋章扎到自己身体的肉上，在车间趁午休时上吊了。别人发现了，马上解开绳子，急救车送他去

医院。此后马上就给发了住房证。他现在还住院哪，不过他算走运了，房子不大，可设备齐全。捞着了。”

司机讲完这段事，娜佳进来。

“要有人偷东西谁管？”司机问。

娜佳耸了耸肩膀，在各屋里走来走去，吹着冻僵的手指。

娜佳刚一进屋就惹施特鲁姆生气。

“你把领子放下来好不好，”他说，可是娜佳摆了摆手，朝厨房那边喊：

“妈妈，我饿坏了！”

柳德米拉·尼古拉耶芙娜这一天真是精力非凡，异常能干，施特鲁姆甚至觉得如果她把这份力量放在前线战事上，那德国人早就滚出莫斯科百里之外了。

自来水工人扭开了暖气开关，烟囱正常，不过很不暖和。把修理煤气的师傅叫来可不是易事。柳德米拉·尼古拉耶芙娜把电话打到煤气站站长那里，站里派来了急修队的一个工人。柳德米拉·尼古拉耶芙娜点燃了所有的煤气炉，放上熨斗，虽然火力微弱，但已经可以不穿大衣了。经司机、水暖工和煤气工人这一番劳作之后，吃饭已经不是任何问题了。

柳德米拉·尼古拉耶芙娜一直到深夜都在忙家务。她在刷子上缠了抹布，揩拭天花板和四壁的尘土。擦去枝形灯上的尘土，把干枯的花枝拿到后门，扫出了一堆堆的垃圾、废纸和破布。娜佳嘟嘟啾啾地三进三出去刷水桶。

柳德米拉·尼古拉耶芙娜把厨具和食具都洗刷干净后，就指点维克多·帕甫洛维奇擦盘子和刀叉，可没敢让他擦茶具。她在盥洗室大洗起来，又忙着上炉子去化油，然后拣选从喀山运回的土豆。

施特鲁姆给索科洛夫打电话，玛丽娅·伊万诺芙娜来接电

话：

“我已让彼得·拉夫连季耶维奇去睡觉了，他路上累了，不过要是有什么急事，我可以叫醒他。”

“不，不，我没事，想聊聊天，”施特鲁姆说。

“我真高兴，”玛丽娅·伊万诺芙娜说，“我总想哭。”

“到我们家来吧，”施特鲁姆说，“您家怎样，晚上有空吗？”

“瞧您说的，今天可不行，”玛丽娅·伊万诺芙娜笑着说。“柳德米拉和我都忙得不可开交。”

她问了限量用电用水的情况。他忽然粗声粗气地说：

“那我马上把柳德米拉叫来，让她接着说用水的事。”他当即又带着明显的玩笑口吻说：“可惜，太可惜了，您不能来，不然我们可以一块儿读福楼拜的《马克斯和莫里茨》。”

然而她并未以玩笑作答，只是说：

“我呆会再打电话，如果我一间房子都忙得焦头烂额，那柳德米拉就更可观了。”

施特鲁姆意识到她是为他粗鲁的语调而不快。忽然间他又想回喀山了。人心可真是不可猜测呀。

施特鲁姆给波斯托耶夫拨了电话，但他家的电话关上了。

他给物理学博士古列维奇打电话，是邻居接的，说是古列维奇到住在索科尔尼克的姐妹那里去了。

他给切佩任打电话，但没有人接。

忽然电话铃响，是一个男孩子要找娜佳，可是她这时候正好去倒垃圾。

“谁找她？”施特鲁姆厉声问道。

“这无关紧要，是个熟人。”

“维佳，别在电话里瞎扯了，帮我挪挪柜子，”柳德米拉·尼古拉耶芙娜说。

“我能跟谁瞎扯，我在莫斯科是个多余的人，”施特鲁姆说，“你还是给我点吃的东西吧。索科洛夫已经吃足了，都睡下了。”

柳德米拉好像把屋子搞得更乱了，到处是一堆堆的内衣，从柜子里拿出来，全放在地板上。锅、盆、口袋遍地都是，房间和走廊里无法迈步。

施特鲁姆原以为柳德米拉不会先进托利亚的房间，可是他错了。

她心事重重，脸涨得通红地说：

“维佳，维克多，把这个中国瓷瓶放在托利亚房里的书架上，我已把瓶擦干净了。”

电话铃又响了，他听到娜佳在说话：

“你好，我哪儿也没去，妈妈赶我去倒垃圾了。”

可是柳德米拉·尼古拉耶芙娜在催促他：

“维佳，帮帮忙，别睡哪，还有这么多事要做。”

女性的本能是何等坚强，何等有力而质朴。

入夜，家中已井然有序，各个房间都已暖洋洋的，战前习惯的摆设又复原了。

一家人在厨房就餐。柳德米拉·尼古拉耶芙娜烤了一些饼，用白天煮好的粥做了黍米饼。

“刚才谁给你打的电话？”施特鲁姆问娜佳。

“一个男孩子，”娜佳回答说，她笑了，“他已经打了4天电话，终于打通了。”

“你怎么，和他通信吗？事先告诉他我们要回来？”柳德米拉·尼古拉耶芙娜问。

娜佳很生气地皱了皱眉头，耸了耸肩膀。

“哪怕有个狗给我打电话也好，”施特鲁姆说。

夜间维克多·帕甫洛维奇醒了。柳德米拉穿着内衣站在敞开着  
的托利亚房门前说：

“托连卡，看见了吗，我都收拾好了，你的房间也收拾好了，就象没有打过仗似的，我的好孩子。”

## 26

撤退回来的学者们济济一堂，会集在科学院的一个大厅里。

这里有年迈的和年青的，面色苍白的，华发脱落的，有眼大无神的，也有眼睛虽小但目光炯炯的，有额头宽的，也有额头窄的，大家相聚，都回味着过去那段富于诗意的生活：潮湿的床单和放在冷冰冰的屋子里的潮湿的书，穿着大衣竖起领子讲课，用冻僵的红红的的手指书写公式，用嫩滑的土豆和白菜叶做莫斯科式凉菜，争先恐后等着开票儿，一想起就令人心烦的咸鱼和补助的素油，这一切忽然间都过去了。熟人相会，欢声笑语，互相问候。

施特鲁姆见切佩任站在科学院院士什沙科夫身边。

“德米特里·彼得罗维奇！德米特里·彼得罗维奇！”施特鲁姆连声呼唤，看着他和蔼的脸庞。切佩任拥抱他。

“您在前线的孩子们有信来吗？”施特鲁姆问。

“他们都好，常来信。”

施特鲁姆见切佩任皱了皱眉头而没有笑意，便明白他已经知道托利亚的死讯。

“维克多·帕甫洛维奇，”他说，“请向尊夫人致意，深深的敬意。代表我，也代表娜杰日达·菲奥多罗夫娜。”

切佩任马上又说：



“我看了您的大作，很有意思，非常重要，比想像的重要。您知道，这篇文章的重要性可能超出我们的想像。”

他于是吻了吻施特鲁姆的额头。

“那有什么，没什么，没什么，”施特鲁姆说，先是心绪慌张，马上就满面春风。他来开会的时候，还很不安地想过：谁看过他的著作，会作何评价？可万一谁都没看呢？

听切佩任这一番话后，他立即充满信心，关于他，关于他的著述肯定会成为这里唯一的话题。

什沙科夫站在旁边，可是施特鲁姆有满腹的话要对切佩任倾吐，当着别人，特别当着什沙科夫的面，这些话是不能出口的。

看着什沙科夫，施特鲁姆总想起格列勃·乌斯平斯基的戏言：“金字塔式的水牛！”

什沙科夫方方正正、肉乎乎的大脸，狂傲的厚嘴唇，粗大的手指，修剪得很整齐的指甲，银灰色的密实的平头，一套缝制合体的西装，这一切都让施特鲁姆感到不快。他每次遇到什沙科夫都会想：“他认得出我吗？”，“会打招呼吗？”而当什沙科夫启动他那两片肥厚的嘴唇慢吞吞说上几句听起来也象牛肉一样不好嚼的话时，施特鲁姆则又好笑，生自己的气。

“骄傲的公牛！”谈起什沙科夫时，施特鲁姆对索科洛夫说，“我见了他就手足无措，就象小地方的犹太人见了骑兵中校。”

“你想想看，”索科洛夫说，“他的出名就是因为不承认显影中看到的正电子。每个研究生都知道院士什沙科夫错了。”

索科洛夫很少说别人不好，不知是出于谨慎，还是由于宗教感情，不许说亲近者的不是，然而索科洛夫总觉得什沙科夫可气，所以彼得·拉夫连季耶维奇经常指责他，讥笑他，克制